

高晓芳 著

晚清洋务学堂的

外语教育研究



商務印書館

晚清洋务学堂的 外语教育研究

高晓芳 著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高晓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ISBN 7-100-05255-6

I. 晚… II. 高… III. 外语教学—教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H0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3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Wǎnqīng Yángwùxué táng de wàiyǔ jiàoyù yánjiū

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

高 晓 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255-6/H·1265

2007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2

定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我国有文献可考的外语教育历史悠久,而现代意义的西方语言文字教育始自晚清的洋务学堂。关于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近 20 年来学界从社会文化或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有过探讨,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书从语言学入手,采用史料考据的实证方法和横向参照的比较史学方法,考察晚清外语教育实践的基本事实与规划得失。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迫于西方诸国的多重打击,清政府创办洋务教育,意在培养人才,抗衡列强,进而走上富强自立之路。在此过程中,西方语言文字作为借鉴世界先进知识与科技的桥梁备受重视,成为洋务教育的先导与核心。

晚清洋务学堂外语教育的语言学考察在占有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展开。微观方面,考察了四所典型的外语学堂,关注其外语教育实践的基本事实,既有对办学背景、历史沿革、机构组织、师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考试等内容的细致描写和客观梳理,也有对教学成就、影响和特点的深入分析与总结。

为了更清楚地呈现晚清外语教育的基本状况,微观考察还将外语学堂与同期有代表性的其他类学堂进行对比,主要结论为,外语学堂以培养政府需要的翻译与外交人才为主要任务,重视翻译能力的培养;强调国学知识,旨在造就“知书明理”之才;努力使教习与教材“本土化”;这类学堂虽然希望培养实业与科技“通才”,但效果并不明显。

宏观考察关注晚清的外语教育规划,包括晚清政府在实施外语教育过程中发挥的职能、相关政策、经费来源、开设外语的语种和比例、外语教育与汉语教育的关系、成效、得失等。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洋务学堂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在引

进西学的同时,以新的理念、新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观念。研究这一段外语教育既具有语言学方面的意义,也具有教育史和文化史方面的意义。

知识领土

——序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

中国外语教育的历史起码可以上溯至汉代,但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始自晚清洋务学堂。中国教育的历史可以上溯更远,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亦始自晚清洋务学堂。史家对洋务运动有褒有贬,但中国现代化的蹒跚起步不能说与洋务运动没有关系。上述三端,便可知研究晚清洋务学堂外语教育的意义。

高晓芳是大学的外语教师,研究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历史,“外语教育”是其长,但“历史”二字是其短。人们常说“扬长避短”,晓芳在研究中则是“扬长补短”。知“避短”者是“智叟”,要“补短”就得学移山的“愚公”,得有勇气,得使傻劲。搜集哪些史料?到哪里搜集这些史料?还得练练古文去读懂这些史料。为“补短”而付出的艰辛,只有自己知。

学界对晚清洋务学堂外语教育研究不多,我自己知之更少。导师的特权就是可以做“第一读者”,我利用特权从晓芳的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新知:“亦思替非文字”的真实身份,四夷馆外语教育的性质,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实施的时间,各个学堂所用外语教材的基本状况,上海广方言馆的经费划拨,湖北自强学堂于光绪己亥年举行的五门外语大考的试卷,以及湖北自强学堂与湖北方言学堂之间的承继关系,等等。

这些新知,有些也许就是学界的新知。但我不想用“填补空白”来述说,这不仅因为“填补空白”已成为廉价的俗语,而是我更关注晓芳的研究所留下的学术“空白”。在我的意识里,因学者的研究而留下学术“空白”,比填补空白更有意义,正如画画儿、写字的“飞白”更具艺术魅力一样。

2006年元月24日下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召开青年学者座谈会,我以所长的身份在会上作了《呵护精神家园》的即兴演讲。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精神,鼓励大家去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不断扩展、精心呵护自己的精神家园。个人的精神家园汇总起来也就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国家的知识领土。

是的,一个国家不仅有地理意义上的领土,还有与之同等重要的“知识领土”。所谓“知识领土”,就是一个国家拥有知识的多少,尤其是拥有自主产权的知识的多少,具有优势地位的知识领域的多少。

中国陆地960万平方公里,并有领海38.8万平方公里,专属海域300万平方公里。这近13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与海洋,就是我中华领土。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其实同许多国家相比,陆地资源并不富饶;淡漠的海洋意识影响了对海洋的经略,海权严重受侵:一些岛屿被侵占,一些海域被切割,海洋资源遭掠夺,航线安全难确保。戍边卫国,经略陆海,国人使命已经十分沉重。然而巡逻中华的知识领土,立即会产生更大的危机感:中华传统知识的传承与研究,包括被称作“国学”“民俗”的东西,有许多已经赶不上邻邦,甚至连中药制品的世界份额也多被外国占有。传统知识领土在片片丢失!

世界各族人民都有自己的文化,有许多还异常灿烂,这些文化

合成了全人类的知识疆域。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比如全世界五六千种语言,我国能大体了解的语种有多少?能够使用或是研究过的有多少?对人类知识领土的拥有,怕远不如我地理领土与世界面积之比值!

信息时代,新知识的产生如同爆炸般迅疾。我国适时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理念,但真要在新知识领域创造自主知识产权,获取新的知识领土,不可能“一蹴而就”!

地理领土是有限的,扩张侵略不得人心。而知识领土是无限的,国国可以共享,人类拥有的我们都应拥有,因为我们不再闭关锁国,要走入世界。

戍边卫国人人有责,当然,军人负有更多的责任。为国家的知识领土开疆拓地亦人人有责,不过,作为知识的守望者与创造者的知识分子,当然负有更为重大的责任!

李宇明

2006 年教师节

序于北京俱闲聊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范围	1
二、研究现状综述	3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6
四、依据的文献史料	7
五、指称外语的词语	9
第二章 近代以前的外语教育小史	20
一、元代以前的外语教育活动	20
二、元代回回国子学的外语教育	22
三、明代四夷馆的外语教育	30
四、清初俄罗斯文馆的外语教育	46
五、早期外语教育的特点与影响	58
第三章 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上)	61
一、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	61
二、上海广方言馆的外语教育	120
第四章 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下)	153
一、广东同文馆的外语教育	153
二、湖北自强学堂的外语教育	174
第五章 洋务外国语学校与其他学堂外语教育的比较	207

2 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

一、福建船政学堂	207
二、上海中西书院	214
三、洋务学堂与福建船政学堂及上海中西书院外语教育 的比较	222
第六章 晚清外语教育规划	226
一、外语教育规划	226
二、晚清外语教育规划	227
三、影响晚清外语教育规划的不利因素	240
四、晚清外语教育规划的现实教益	242
参考文献	247
附录	259
后记	300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范围

“晚清”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指的是从鸦片战争爆发(1840)到清朝灭亡(1911)这一阶段。本书以此 70 余年为主要时间跨度，考察洋务学堂外语教育的时代背景、沿革、管理、经费、招生、课程设置、教材、试卷等基本事实。为了体现教育的延续性，并揭示晚清外语教育自身的特点与成就，考察范围适当前移，对元、明、清初的外语教育活动也进行了历史回顾与梳理。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使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暴露无遗，更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清廷内部分化出“洋务派”与“保守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一些权高位重的朝廷大臣或封疆大吏，如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在清廷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以自强振兴、救亡图存为宗旨，展开了一系列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活动，史称“洋务运动”。

兴学堂、育人才是洋务运动的核心。洋务派本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和“变器不变道”的原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自同治元年(1862)起，相继在北京、上海、广

州、天津、南京、武昌等地创办了 30 余所“洋务学堂”，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走上复兴之路。

从培养目标与教学重点来看，洋务学堂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外国语文学堂、科技实业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本书的“洋务学堂”专指外国语文学堂，行文中为了有别于其他两类学堂，也使用“洋务外国语文学堂”、“外国语文学堂”与“外国语学堂”的称法。所谓“外语”^①，指的是“外国的语言与文字”。

之所以将外国语文学堂作为考察晚清外语教育视点，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首先，三类学堂中，外国语文学堂创办的时间最早。这类学堂既是近代外语教育的先导，也是其他两类学堂外语教育效仿的对象，其外语教育具有学科领先性与权威性。

其次，虽然三类学堂的培养目标与教学重点有区别，但在外语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点。比如三类学堂中，外语既是最早开设的学习科目，也是必修课；学生既要掌握外语还要学会一门专业；各学堂在重视外语学习的同时，不忽视汉语学习。因此，外国语文学堂的外语教育具有代表性与普遍性。以这类学堂为考察对象将有助于达到观其一而知其余的效果。

^① 中国的外语教育活动历史悠久，但是在教育史文献中，“外语”一词直至民国末年才出现。关于“外语”及相关词语的演变过程与原因，笔者进行了考证，详细内容请见第一章五（一）至（二）。

二、研究现状综述

我国现代意义的外语教育发轫于晚清,对于晚清的外语教育,学界有所关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教育史著作,如《中国外语教育史》(付克 1986)、《中国英语教学史》(李良佑、张日昇、刘犁 1988)、《清代同文馆之研究》(孙子和 1977)、《清季同文馆》(苏精 1978)、《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苏精 1985),以及近 20 篇专题论文中。

《中国外语教育史》是我国大陆学者研究外语教育历史的第一部专著,时间跨度起于西汉,止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内容以学校外语教育为主线,兼有新中国成立前的出国留学,外国人在华办学,以及自新中国成立到 1984 年年底期间外语教育的多种层次(高等专业外语教育、高等公共外语教育及中小学基础外语教育)、多种形式(学校外语教学、业余外语教学、外语电化教学)、多个方面(科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教育展望)的内容,对晚清的外语教育亦有说明。

该书共 15 章,章目为:中国早期的外语教育(1840 年以前)、中国近代的外语教育(1840 年至 1919 年)、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留学及外国人在华办学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影响(1870 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 30 年的外语教育(1919 年至 1949 年)、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过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语教育的关怀和指导、高等外语院系的外语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公共外语教学、中小学外语教学、外国语学校的外语教学、业余外语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外语电教工作以及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展望。

从篇幅与取材来看,《中国外语教育史》侧重新中国成立后的外语教育,涉及面广,层次多,材料丰富,既汇集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文件,又有外语师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语种分布的列表与统计数据,为梳理这一时期外语教育的基本事实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不失为从事相关内容研究,尤其是俄语教育研究重要的参考书。

基于全书的重点所在,该书对于晚清外语教育的介绍篇幅小,只占全书的2.7%,史料简略,以致部分内容存有讹误,比如元代回回国子学教授的“亦思替非文字”并非波斯文;(高晓芳 2005a)明代四夷馆内教习的不全是外语;京师同文馆实施八年课程表的时间不是同治四年(1865)等。为了呈现当时外语教育的基本状况,有些事实需要澄清,有些事实需要补充。

此外,该书对当时开展外语教育的时代背景、学堂沿革、管理、经费、招生、课程设置等基本事实大多几句带过,缺乏对教育经费、教材与试卷情况的说明,也没有对不同类别学堂外语教育的特点进行对比、总结,更没有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对当时外语教育的得失进行评价。

《中国英语教学史》自称是《中国外语教育史》的“姐妹篇”,论述的是英语教学的历史。全书以1949年为界,前后各一半。清末以前的章目有四:早期的英语教学;同文馆及各类洋务学堂;清末的留学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语教学。

首章涉及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第二章论述洋务学堂的英语教学,包括外国语文学堂英语教学的管理、招生、要求、大致内容,以及其他两类洋务学堂所设外语语种的列表。第三章介绍清末幼童留学美国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第四章论及20世纪初新学制

(又称“癸卯”学习)颁布实施后,书院、学堂、教会学校、中学及高等学校开展英语教学的情况。

就章目内容与范围而言,《中国英语教学史》针对《中国外语教育史》的遗漏作了许多补充,提供的材料也颇为丰富。但总的来说,该书属于英语教学的专项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其他外语的教学。第二章缺少洋务学堂英语教学的教材、试卷等重要信息。

《清代同文馆之研究》为台湾学者孙子和所著,内容颇为庞杂。单从其繁杂的目录来看,它不算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的色彩。对此,作者自己在前言中说:“自知有‘资料堆积’、‘冲淡要点’、‘松懈文意’等缺点。”不过,书中提供的资料弥足珍贵,陈学恂(1986)编撰《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就有所引用。孙子和自称写作该书是“实欲提供较为完整之资料,以利有志研究此一问题者之参考”。这些都揭示了该书的史料价值。

《清季同文馆》和《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也是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者是前者的增补本。它们与《清代同文馆之研究》在内容上颇为重复,并有类似的特点,此不赘述。不过,该书珍贵的史料价值在高时良(1992)编辑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陈学恂所编书籍以及本书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专题论文方面,在1979-2006年“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20多篇论文与晚清的外语教育有关。其中,约82%(19篇)属于京师同文馆的个案考察,内容相当丰富,涵盖教育模式、特点、历史地位、贡献、教育性质、组织结构等。余下的论文中,有的是针对学堂主办人的评述(比如介绍筹建湖北自强学堂的张之洞,北京:北

平文化斋刊,2篇),有的是考证同文馆的教科书(1篇),有的是上海广方言馆的总体考察(1篇)。

专题论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先生的《晚清同文馆外语教学与外语教科书的编纂》(2004)一文。该文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唯一一篇较为详细地介绍当时洋务外国语学校中外语教学用教材的论文,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①

应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天了解近代外语教育的总体情况大有裨益,但或许由于分析角度、史料获取以及选题的区别,有关洋务学堂外语教育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一是基本事实的梳理与勘误;二是建立在基本事实梳理基础上,针对当时外语教育的宏观探讨与得失分析。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 目的

前人筚路蓝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与线索。本书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达到四个目的:一、将我国从古代到近代学校外语教育的基本事实进行梳理贯串;二、根据教学目的、学习方式、学习语言的类型、教学规模、特点等,对我国从古代至近代学校外语教育的历史进行分期,并将研究重点放在晚清;三、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对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进行评价,分析其得失,进而以史为鉴,从中寻求启发现实的教益,为国家今后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四、由于近代外语教育在中国现代化的

^① 有关这些研究论文的详细情况,请见附录一。

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这段历史,也是为了给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份参考资料。

(二) 意义

诚然,由于满清政府的昏庸无能等因素,与洋务运动一样,洋务学堂没能担负起“救亡”“复兴”的历史责任,也因为如此,洋务学堂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与谴责。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这种批评虽不无事实依据,却失之笼统与公允,因为它过于关注其政治功能与历史使命,忽视了其教育功能。

如今,我们已经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历史成见与个人情感中的某些偏颇因素,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更为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研究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

本书的研究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以史料为基础,梳理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史,具有外语教育学科史上的意义;二、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揭示我国从古代至近代学校外语教育的基本事实,具有应用语言学学科本身认知上的意义;三、从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视角分析和评价作为近代始源的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总结其得失,以史为鉴,为当今外语教育的发展寻求有益的启示,具有现实意义;四、在一定程度上,晚清的外语教育促进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因此,研究近代的外语教育也具有文化史方面的意义。

四、依据的文献史料

教育史研究无不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研究晚清的外语教育也